

本书属西南财经大学财经领域廉政建设研究基地成果

建设廉洁政治的

探索与实践

JIAN SHE LIAN JIE
ZHENG ZHI DE
TAN SUO YU SHI JIAN

——新时期反腐倡廉新论

欧 兵 段江波 〇 主编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建设廉洁政治的 探索与实践

JIAN SHE LIAN JIE
ZHENG ZHI DE
TAN SUO YU SHI JIAN

探索与实践

——新时期反腐倡廉新论

欧兵 段江波 主编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设廉洁政治的探索与实践:新时期反腐倡廉新论/欧兵,段江波主编. —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504-2982-6

I. ①建… II. ①欧…②段… III. ①反腐倡廉—研究—中国
IV. ①D6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8300 号

建设廉洁政治的探索与实践:新时期反腐倡廉新论

欧兵 段江波 主编

责任编辑:孙婧

责任校对:袁婷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封俊川

出版发行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55号)
网 址	http://www.bookej.com
电子邮件	bookcj@foxmail.com
邮政编码	610074
电 话	028-87353785 87352368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15
字 数	290千字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4-2982-6
定 价	78.00元

1.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2. 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可向本社营销部调换。

前言

腐败作为困扰人类社会的毒瘤，几乎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影随形。或许可以说，自从私有观念或私有制产生以来，自从社会权力能够支配物质资源、社会资源以来，腐败也就随之发生。自古及今，无数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对腐败本性以及反腐败焦思苦虑，以期能建设清正、廉洁和高效的政府（政治）。如何控制腐败，建设廉政国家无疑是当代世界各国面临的中心问题之一。关于腐败的存在，一种普遍判断是，人类社会不能完全消除腐败，而只能把腐败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这或许是一种较为清醒、理智的态度，这关涉到对腐败发生和腐败本性的认识。有观点认为，腐败有着深刻的人性基础，这种人性基础是基于生物学或者社会生物学的基础——生物的生存竞争或生存自保的本能，甚至是自私的基因。除此之外，文化人类学似乎也为腐败提供了另一种人性佐证。腐败基于社会文化，即所谓腐败的文化土壤。亚洲国家普遍的裙带关系，重视亲缘-血缘关系的社会文化传统似乎更有利于腐败的发生，由此得出腐败总是与腐败者社会资本的多寡息息相关的结论。当然，更为形而上的剖析则干脆将腐败视为人性恶的体现。在深入到人性善恶的区分时，抛开宗教意义上的人性堕落观点，当我们意识到恶是人性中不可祛除的幽暗成分时，腐败也就成为无法根除的最充分理由了。但我们应该警惕的是，将腐败定义为人性恶的结果，或者进一步将腐败定性为恶，腐败负面价值的定性固然使我们坚定了反对腐败的正义性，但却并不能自然导致腐败的消除。

承认腐败是人性缺陷的结果，却不能推导出腐败的发生机制，还需要对腐败本身作进一步的界定。当我们使用腐败一词时，我们显然不能从原初意义上

去理解，而只能将其放在特定领域中去认知。这亦是思考腐败问题的现代学者会不约而同地将腐败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甚至将腐败直接等同于权力腐败的原因。所谓权力腐败，最通行的理解是为了私人利益而滥用（或不正当地使用）公共权力。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权力本性与腐败之间似乎有天然联系。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实质上道出了专断的、不受限制的权力是腐败发生的根源的事实。这句话与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说法如出一辙：“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因此，防止“权力任性”就很有必要。防止“权力任性”并非要根除权力机制。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权力机制是双刃剑，社会权力、政治权力的发生是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和国家秩序所必需的社会运行机制。权力机制是内嵌于社会组织系统中的，缺乏权力机制，社会是无从运行的。社会契约学说的创立者无论是卢梭、洛克还是霍布斯，都从不同的方面论证了国家产生的必要性，而马克思则证明了国家发生的必然性。问题不在于需不需要权力，而在于如何保证权力的运用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使得公共权力能真正服务于公众。因此，现代政治学在政治制度设计时考虑得更多的是政治架构和制度设计，以及如何能够将权力限制在可控范围内。西方国家更多采用的是政治架构上的分权制衡、政党轮替、法治框架和新闻媒体监督的制度性因素来避免权力专断。显然这种制度设计未必适合中国反腐现实。但可以肯定的是，防止“权力任性”的根本是保证权力设置上和使用上的法制化、权力运行过程的透明化和可追溯，以及权力使用后果责任的可追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形象地比喻权力使用的透明性和权力全程处于监督之下，这使得滥用权力无所遁形。现代经济学对腐败的发生提供了一种经济学解读，将腐败行为人视为理性经济人，进行成本-收益的核算。当腐败成本（风险）大于腐败收益时，腐败不会发生；而当腐败成本（风险）小于腐败收益时，腐败则易于发生。这种理论提出应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惩治，使得腐败风险增大到行为主体不敢轻易尝试腐败，从而消除腐败动机。客观地说，限制权力，防止权力任性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增加腐败成本以及增大腐败行为的风险。但基于对人类腐败的认知，落实到具体的腐败主体，其精神变质和心理蜕变演

化是相当复杂的，腐败动机也是千差万别的。因此，不同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经济制度以及不同的文化形态下，社会主体腐败的发生和演变是复杂多变的。正因此，每个国家在防止腐败、惩治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具体举措上既需要把握腐败共性，又需要把握腐败个性（基于所在国家特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而发生的腐败特性）。如此，每个国家开展反腐倡廉时，既可以吸取他国的成果、经验，开展国际反腐合作，又需要建立适合本国特色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和反腐措施。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政党制度以及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传统）显著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着自己特色鲜明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政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这就意味着中国反腐倡廉必须基于自己的国情进行反腐倡廉的制度设计和开展反腐倡廉的实践行动。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理念及政党理想与腐败是势不两立的。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建立清正廉洁高效的共产党政权，这既是历史事实，也是现实。新中国成立以来，惩治腐败和建设廉洁政治一直是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重要职责。虽然采取的方式和措施因所处历史环境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特点，但从未松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迅猛发展，市场经济对政治权力释放出较大诱惑力，各种制度建设未能及时变革，公共权力主体的权力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约束，因此出现了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现象，党风政风受到了严重破坏，以至于到了“党风廉政建设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地步”。如何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蔓延，彻底扭转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建设廉洁政府，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所必须解决的紧迫任务和承受的千钧重担。自2012年走到今天，我们共同经历了一场伟大的反腐倡廉风暴，亲身体验和感受到了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亲身体验和感受到了党风、政风、民风以及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走到今天，我们更能清晰地领会到新时期这场反腐风暴并非疾风骤雨式的反腐运动，而是一次根本性反腐革命，是深谋远虑、精心设计和坚决行动的一次制度革命，是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的基础制度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着眼于新的形势任务，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内容，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中央纪委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遵循党章规定，聚焦中心任务，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重大成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重大成效”充分肯定了近五年来反腐倡廉的伟大成就。客观地说，近五年来的反腐倡廉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更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能力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创新、发展、完善的活力。近五年来的反腐倡廉显然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反腐倡廉模式，最突出的特色表现在：

一是执政党真正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尤其是“全面从严治党”，这是抓住了中国廉政建设的源头。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执政党，其执政影响力全面渗透到整个国家肌体，执政党自身是否清正廉洁直接决定了党风、政风、民风和社会风气的好坏。这五年的党风廉政建设既有对党自身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有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转化。整治“四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严明党的纪律、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加强党内法规建设、落实党内监督、强化中央巡视组工作，将反腐倡廉的“手术刀”首先挥向党自身的肌体，清除政治腐败微生物，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执政党动真格，中国政治生态为之一振，清正廉洁之气亦如春风扑面而来。

二是严厉惩治腐败。做到反腐败全覆盖、零容忍、不封顶，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致力于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这是为中国建设廉洁政治铸就坚固的制度基石。十八大以来全国查处了多起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截至2017年2月有160多名省部级腐败官员落马。所谓“打老虎，拍苍蝇”，就是既要惩治巨贪巨腐，又要注意清除群众身边的腐败。这极大地震慑了腐败分子。《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的颁布施行构建了完善的党

内法规体系，形成了严厉的党内监督。构建国家监察体系，实现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监察的全覆盖，加强反腐败立法，都是扎紧反腐败的制度笼子。如此一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成效亦是水到渠成的事。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薄薄的论文集是我们集体努力的结果，虽然研究深度和广度还很不够，但却是对近年来我国伟大反腐倡廉行动的一次及时的理论响应，是服务于这场伟大而正义的行动的。我们的研究是随着近五年的反腐倡廉行动展开的，因此不可避免会带有一些“时代”痕迹，有些观点甚至似乎有“落后”于现实之疑，但却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实践的实时的理论回应。收入本论文集的17篇论文，被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基础理论”部分收入的4篇论文从“正义”的视角导入对反腐倡廉主题的讨论。刘世强副教授的《共识塑造、中央权威与中国改革的再出发》道出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破局之艰难以及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处理的若干重大问题。谭亚莉副教授两篇关于“正义”的论文，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出发讨论了“制度正义”的问题，而制度正义毫无疑问是制度反腐所必须面对的理论问题。胡军方博士则分析了腐败与反腐败斗争中民众的正义感问题。

第二，“腐败分析与我国反腐倡廉实践”部分收入了8篇论文，苏森森博士的论文借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理论，从文化维度的视角分析了我国腐败的发生。李姗姗博士对权力腐败心理的演化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梁建华博士则从行贿者的视角借用社会资本理论对贿赂资本进行了分析。杜孝军博士和叶长安博士分别从法治理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视角回应了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依法治国精神中的“法治防腐反腐”思想。刘帅和张建东博士则集中论述了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与反腐倡廉的内在联系。王旭涛的论文更是以“新常态”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第三，“廉洁文化建设与反腐倡廉教育”部分收入了5篇论文，其关键词是“廉洁教育”。胡军方博士探讨了在廉洁文化建设中的廉耻感培育的重要性。段江波副教授和吴俊蓉博士的论文讨论了反腐倡廉融入生活世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欧兵研究员与段江波对高校正风肃纪长效性何以可能的问题进行了

探讨。董海浪博士和张玉莲硕士的论文都是围绕对大学生的廉洁教育展开论述的，前者着重关注网络世界中的廉洁教育可能性的问题，而后者是从更广泛的大学生教育入手讨论廉洁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第四，“域外廉政建设一瞥”部分是对西方国家的廉政建设的经验提炼和借鉴。张小波博士从美国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的廉政运动的历史研究中试图对处于改革转型时期的中国廉政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范伟伟博士对英国廉政建设经验的全面总结和提炼亦是最终回应了当今中国的廉政建设。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论文集所收入的论文大部分都是首次公布，其中部分论文已经在其他刊物发表或收入其他文集，之所以再重新收入本论文集主要是考虑到主题的集中性，方便读者检阅。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论文集是西南财经大学“财经领域廉政建设研究基地”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编者

2017年2月

目录

看养廉自润列子致思引文青廉

121	刘世强	共识塑造、中央权威与中国改革的再出发	刘世强 / 3
121	谭亚莉	基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分析的经济制度正义建设	谭亚莉 / 11
170	谭亚莉	制度理论对社会正义建设的启示	谭亚莉 / 28
170	胡军方	腐败与正义感	胡军方 / 43
181	苏森森	基于文化维度理论的腐败原因分析	苏森森 / 55
181	李姗姗	权力腐败心理的演化分析及对策研究	李姗姗 / 71
181	梁建华	贿赂资本分析	梁建华 / 82
181	杜孝军	廉政建设视域下的法治理论基本问题研究	杜孝军 / 93
181	叶长安	试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制度建设	叶长安 / 100
181	王旭涛	新常态下中国共产党反腐建设探析	王旭涛 / 112
181	刘帅	党员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养内涵研究 ——以道德素养为例	刘帅 / 122
181	张建东	论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的党纪防腐思想：理论、价值与实践	张建东 / 141

一、基础理论

共识塑造、中央权威与中国改革的再出发	刘世强 / 3
基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分析的经济制度正义建设	谭亚莉 / 11
制度理论对社会正义建设的启示	谭亚莉 / 28
腐败与正义感	胡军方 / 43

二、腐败分析与我国反腐倡廉实践

基于文化维度理论的腐败原因分析	苏森森 / 55
权力腐败心理的演化分析及对策研究	李姗姗 / 71
贿赂资本分析	梁建华 / 82
廉政建设视域下的法治理论基本问题研究	杜孝军 / 93
试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制度建设	叶长安 / 100
新常态下中国共产党反腐建设探析	王旭涛 / 112
党员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养内涵研究 ——以道德素养为例	刘帅 / 122
论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的党纪防腐思想：理论、价值与实践	张建东 / 141

三、廉洁文化建设与反腐倡廉教育

廉洁文化建设中的廉耻情感培育研究 胡军方 / 157

“生活世界”视野下的反腐倡廉教育 段江波 吴俊蓉 / 166

建立健全高校党政系统正风肃纪长效化机制研究 欧兵 段江波 / 176

新时期青少年网络廉洁教育对策探析 董海浪 / 186

大学生廉洁教育论析 张玉莲 / 194

四、域外廉政建设一瞥

美国的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对中国当今廉政建设和改革的启示
..... 张小波 / 205

制度建设与道德教育相结合：英国的廉政建设及其启示 范伟伟 / 221

共识塑造、中央权威与

中国改革的成功

一、基础理论

摘要：政治体制的构建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中国改革以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改革的共识塑造进入了新阶段。本文旨在探讨这一阶段的特点、挑战与机遇，分析共识塑造对改革成功的重要性，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文章指出，共识塑造不仅是改革成功的关键，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通过构建广泛、坚实的改革共识，可以有效化解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增强改革的凝聚力和执行力。同时，也要警惕共识塑造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倾向，确保改革共识真正深入人心，转化为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共识；中央权威；国家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梦。这一决定不仅明确了改革的总目标，也提出了改革的总方向。在这一过程中，共识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为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也为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通过广泛征求民意、凝聚共识，可以有效化解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增强改革的凝聚力和执行力。同时，也要警惕共识塑造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倾向，确保改革共识真正深入人心，转化为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政治体制与中国改革的双重变奏

政治体制是国家的基石，政治体制的变革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政治体制的变革与改革共识的塑造形成了双重变奏。一方面，政治体制的变革为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改革共识的塑造为政治体制的变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这种双重变奏使得中国改革能够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首先，政治体制的变革为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法治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改革有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其次，改革共识的塑造为政治体制的变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通过广泛征求民意、凝聚共识，可以有效化解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增强改革的凝聚力和执行力。这种双重变奏使得中国改革能够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共识塑造、中央权威与中国改革的再出发

刘世强^①

摘要：政治行动的前提在于确立共识，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源于强大的政治共识。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改革的共识再次被凝聚起来。在此基础上，为了打破利益固化、超越观念分歧，进而保障改革的顺利推进，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严厉惩治腐败和顶层机构设计进一步确立了中央权威，但也出现了少数官员干部不作为、将反腐视为权宜性行为以及民众情绪反弹等问题。如何打破改革过程中的权威与分权悖论，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考验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智慧。

关键词：政治共识 权力集中 中国改革 新权威主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新的号角，《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这为中国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蓝图业已绘制，接下来的重点即是如何让改革的各项举措真正落地。本文通过简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指出了政治共识和国家权威对于推进改革的重要性，也对改革过程中存在的悖论进行了理论思考。

一、共识塑造与中国改革的再出发

从普遍意义上讲，政治行动的前提在于确立共识。顾名思义，共识即共同

^① 作者简介：刘世强，男，1984年生，博士，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与中国对外战略。该文得到西南财经大学重大基础理论研究项目的支持，项目名称是“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道路自信研究”，项目号是“JBK151132”。

的认识，或一致的看法。《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将“共识”定义为，在一定的时代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的人们共有的一系列信念、价值观念和规范准则。^①

推而广之，政治共识就是一国精英集团和社会大众对政治理念、制度规则和公共政策总体一致的态度和看法。尽管人们由于个人禀赋、思维观念、社会经历等方面的差异对国家公共事务拥有不同的认知和诉求，但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必须寻找社会大众都能接受的政治最大公约数。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共识是一国实现政治稳定的重要前提，也是开展政治行动的必要保障。反过来，如果一个政治共同体缺乏起码的政治共识，往往容易导致政治冲突甚至国家分裂。

毫无疑问，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为重大和富有历史意义的政治行动，带来了中国的国力增长、社会生活变迁以及国际地位的持续提高。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启动，正是源于当时中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巨大政治共识。当然，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激烈的观念冲突。在传统意识形态的观念束缚下，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社会大众都对市场抱以警惕和敌视的目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历史节点上，多重力量的综合作用塑造出了推进中国改革的强大共识。

第一，危机的倒逼效应。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一直处在政治运动与社会革命的旋涡之中。长期革命固然可以打破等级式的传统秩序，建立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结构，然而，“抓革命促生产”严重违背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造就了中国社会的普遍贫困，国民经济甚至濒临崩溃边缘。当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都面临问题时，革命的边际收益也就趋近于零。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和地区却抓住了世界产业结构转移的历史机遇，通过内部改革和融入现代世界经济体系，迅速实现了经济上的崛起。巨大的现实落差使得中国国民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日益强烈，进而汇聚成要求改变的强大民意。换言之，当时中国的系统性危机已使得改革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

第二，邓小平的个人威望。改革意味着利益的再分配，涉及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往往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打破樊篱，消除阻力。在长期的战争、革命和国内建设中，当时的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积累起了极高的政治威望，属于典型的“克里斯马”式的政治家。在经历几起几落的政治生涯之后，邓小

^① 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55。

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更深刻的体悟，更加具备放手一搏的勇气。当然，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邓小平不可能一下子全盘否定阶级斗争的革命逻辑。对他而言，最大的考验在于如何既坚持革命合理的政治正确，又致力于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邓小平具有高明的政治智慧。他通过“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来否定“两个凡是”，批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改革开放的启动提供了思想准备。同时，他又以“四项基本原则”确立了思想解放的政治边界，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蔓延，保证了中国政治的稳定。正是在这样高超政治智慧的引领下，中国走出了一条“继承中谋求改变”的增量改革之路。

第三，改革带来的普遍红利。如前所述，改革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争论。然而，随着改革带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积极变化，支持改革的呼声日益壮大，“左”的思潮则不断被边缘化。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改革在路径选择上是先农村后城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体在一开始就成了改革的受益者。反过来，他们在生活改善的同时又成为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强大动力，从而汇聚起拥护改革开放政策的“正能量”。乡镇企业、农民企业家，这些新生事物的出现正是底层社会谋求改变、不断创新的结果。

正是通过以上三重力量的共同作用，中国社会出现了支持改革的强大共识，改革被赋予了奋斗、活力、创新等正面含义。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度推动中国迅猛发展的改革共识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破裂。由于法治建设滞后，政府权力这一推动改革之手缺乏有效监督与制约，利益寻租与权力腐败随之而来。部分社会群体在享受到改革的短暂红利之后迅速沦为牺牲者，在市场化、城市化浪潮的裹挟中失去保护、难以自处。在利益持续分化的背景下，改革不再具有天然正当性，丧失竞争优势的人群甚至反对和抵制改革。

进入21世纪以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再一次为中国的发展释放了巨大红利。改革中的失败者似乎一夜间寻找到了新的历史机遇。他们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西部来到东部，纷纷加入农民工大军，成了国际产业链条分工的重要一环。尽管收入微薄，而且承受着超强度和长时间的体力劳动，他们仍然对未来充满信心。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同时，中国在内政上的改革仍在继续，特别是通过改善民生（如废除农业税）使得执政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政治共识和利益阶层的固化，21世纪前十年的改革始终难以触及深层次的体制矛盾。于是，当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中国因改革滞后而带来的治理难题就暴露无遗。曾经因加入全球化进程而有所获益的农民工群体再次面临失业境遇，缓慢成长中的城市中产阶级在高房价、

高通胀情况下经历了财富的再分配过程，政府为摆脱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临时性刺激政策则出现了明显的后遗症。社会矛盾的积累也加剧了思想上的急剧分化，左与右的争论超越了理性对话的层面，变成了相互谩骂与话语攻击。除此之外，诸如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信仰缺失等大量社会问题不断积聚，社会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显著上升的势头。总之，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中国，“改革正在与危机赛跑”，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改革的再出发。

二、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与中国改革的推进路径

重启改革需要再次凝聚起强大的政治共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高举改革旗帜，积极回应社会诉求，中国改革的政治共识再次被聚集起来。2012年12月，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将广东深圳作为首个考察地点，并向邓小平雕像敬献花篮，释放出坚持改革开放的明确信号。随后，他在多个场合表示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一定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提出“改革60条”，并明确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既然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已经确定，那么关键问题就从共识塑造转变为行动部署，如何确保《决定》所列举的各项改革举措部署到位和贯彻得力成为国内外各界关注的焦点。从过去三年左右的实践来看，为了保障改革的顺利推进，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要尝试了三条路径：

第一，党内整风，即通过“八项规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系列政治活动来整顿作风，严肃党纪，以保持政治上的清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肩负着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然而，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脱离群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时有发生，损公肥私、与民争利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提出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显示，自“八项规定”实施以来至2016年5月31日，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